

【理论与方法】

世界历史分期中的“早期现代”理念

李剑鸣

【摘要】“早期现代”最初是一个专用于欧洲历史研究的分期概念,旨在突破传统历史分期中“中世纪/现代”截然两分的局限。美国史学界不仅在这个术语的形成和传播中发挥了主要作用,而且还致力于把它加以“地方化”和“全球化”,以便能用来描述广大“非欧洲”地区和国家历史中相对应的阶段,或有助于建构一个“早期现代世界”。然则“早期现代”牵涉到“现代性”和“现代化”理论,难免引出学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,因而其“合法性”和适用性长期存在争议。中国史学界关于“早期现代”理念的理解、翻译和运用,也有相当复杂的情况,一些相关的问题还需做进一步的探讨。

【关键词】历史分期;早期现代;现代性;欧洲(西方)中心论

【作者简介】李剑鸣,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暨全球史研究院(上海 200433)。

【原文出处】《历史教学问题》(沪),2024.3.3~14

在欧美学者撰写的世界史读物中,我们经常可以见到“早期现代”(early modern)的提法。国内从事欧洲史研究的学者,特别是英国史研究者,对这个术语早有留意,也做过一些讨论,大致把它看成欧洲史家创造的一个用于欧洲历史的分期概念。^①德国学者奥斯特哈默对此却有不同的意见。他在煌煌巨著《世界的演变:19世纪》中谈到,“早期现代”这个术语在欧洲广受质疑的同时,却在非欧洲的学者中间颇受欢迎,原因是他们有意以欧洲式的语言来表述自己国家的历史,以期使之能在更大的范围赢得理解。^②就我目前所读到的材料而言,这两种看法似乎都有商榷的余地。尽管“早期现代”这个术语最初确实专用于欧洲史研究,但在其产生和传播中起关键作用的人却并不是欧洲史家,而是美国学者。随后,极力推广这个术语的应用范围的人,也大多出自美国史学界,其中有一些是在美国工作的非欧美裔学者。在不断传播和运用的过程中,这个术语的含义和用法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,并招致各式各样的质疑和批评。至于这个术语在欧美以外各国史学中的运用情况,自不可一概而论;仅从中国史家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和运用来看,其复杂的程度就超出了通常的想象。

一、“早期现代”理念的形成及最初含义

论及“早期现代”这个概念的缘起,首先牵涉到

欧洲史学中长期通行的经典分期模式。当今为人所熟知的“古代”“中世纪”“现代”三分法,大致成形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这一阶段,并在欧洲史学专业化的过程中得以定型,随后扩散到欧洲以外其他地区的历史书写系统。^③然则历史分期并非史家的专属,欧美诸多涉及历时性研究的学科,大都采纳了“古代”“中世纪”和“现代”的三分模式。就历史意识的一般情况而言,“古代”相对固化,而“中世纪”和“现代”的区分及界线并不稳定。尽管如此,1500年作为区分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年份,依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。可是,始于1500年的“现代”,却是一个没有下限、不断向前延展的时间过程;随着其长度的不断延伸,初始阶段与当前时期的差别也就越来越显著。于是,欧美学界开始有人有意无意地对它进行新的分割,“早期现代”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,成为一个指称“现代”初始阶段的术语。在历法时间上,这个时期一般相当于15-18世纪。

具体来说,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,英语世界(尤其是美国)的语言学、文学、法学、经济学、音乐史、政治学、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,陆续有人使用“早期现代”(early modern times)这一历史时间概念,以指称“中世纪”之后、“现代”之前的几个世纪,或用以修饰这个时期的种种事物或现象。一时间,诸如“早期现

代旅行者”(the early modern travellers,原文如此)“早期现代作家”(early modern writers)“早期现代世界”(the early modern world)“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法律”(th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law)等提法,可见于许多刊物的文章中。而且,“早期现代”常与“中世纪”(medieval或the Middle Ages)“晚期中世纪”(the later medieval)等连用,或两者并置,称“中世纪和早期现代”(the middle and early modern ages)。在这类说法中,已约略显露历史分期的用意。^④不过,从其上下文来看,这时的“早期现代”还更多地用作修饰性的时间概念,尚不具备严格的历史分期的意义。

较早把“早期现代”作为较严格的历史分期概念来使用,是美国的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者所做出的尝试。1884年,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英语文学教授詹姆斯·加尼特在一篇书评中提到,学术界关于英语的历史分期过于复杂和混乱,有“古英语”(Old English or Anglo-Saxon, 1100年以前)“古英语转型”(Old English Transition)“早期中古英语”(Early Middle English)“晚期中古英语”(Late Middle English)“中古英语转型”(Middle English Transition)“早期现代英语”(Early Modern English)“中期现代英语”(Middle Modern English)和“当代英语”(Current English)等一连串的说法。他认为需要加以简化,主张划分为“古英语”(迄于1150年)“中古英语”(迄于1400年)和“现代英语”(始于1400年)三个阶段,且每个阶段可再分为“早期”和“晚期”,而“转型”则可省去。^⑤1890年,他再次表达了同样的分期意见,更明确地把英语的演化阶段简化为“古英语”(Old English,截止于1150年)、“中古英语”(Middle English,截止于1400年)和“现代英语”(Modern English, 1400年以后),而1400-1600年的英语可称作“早期现代英语”(Early Modern English),1600年以后的英语则叫做“晚期现代英语”(Late Modern English)。^⑥此后,“早期现代”逐渐成为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界通行的概念,并有不少相关的讨论。^⑦后来这一用法还辐射到其他语言及文学的研究中,比如,西班牙文学研究界也有相当于“早期现代”的说法,在西班牙文为“de la primera modernidad”。^⑧

另一个热衷于把“早期现代”作用历史分期概念使用的学术群体,出自美国的“文艺复兴”研究界。

在欧洲的学术格局中,“文艺复兴”研究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;但是,当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以后,“文艺复兴”却意外地进入了学术的中心地带。同时,这个领域的学者也不甘于让自己的研究主题继续留在“中世纪”,而力图使之迈入“现代”的门槛。可是,一种主要见于14-15世纪的历史现象,倘若径直贴上“现代”的标签,也不免显得怪异;于是,“文艺复兴”的研究者便把它描述为一个介于“中世纪”和“现代”之间的过程,也就是“早期现代”的开端。后来,他们又发现,如果一直把“文艺复兴”与意大利捆绑在一起,可能削弱它作为“早期现代”开端的合法性,因为“早期现代”的涵盖面逐渐逸出欧洲,进而扩大到全球,而“文艺复兴”若仍然仅只是限于欧洲的事情,就无法在更大范围的历史经验中取得通约性。因之有学者提出了“全球文艺复兴”的理念,试图与“早期现代”的“全球化”保持相同的步调。^⑨此外,还有一些美国学者组成“早期现代文化研究小组”,极意容纳关于欧洲和北美以外地区的研究,努力消除“文艺复兴”研究的“欧洲中心论”色彩。进入21世纪,这批学术同仁还创办了一份刊物,名为《早期现代文化研究杂志》(*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*)。据说在这种新的学术风气中,那些依然抱定“文艺复兴”不撒手的学者,便难免“保守”之讥;而使用“早期现代”的人,则显得“更加进步”。^⑩不过,在美国学术界,“文艺复兴”和“早期现代”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理顺。比如,在2001年美国文艺复兴研究会的芝加哥年会上,有一个小组讨论会的主题便是“文艺复兴对早期现代”(Renaissance vs. Early Modern)。

美国史学界广泛使用“早期现代”这一术语,在时间上似乎落后于前面提到的几个学科。一般认为,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林恩·桑代克(Lynn Thorndike)1926年出版的《文明简史》(*A Shor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*),最早用“早期现代”来替代“文艺复兴”,这标志着“早期现代”在美国史学界的问世。其实则不然。美国史家提到“早期现代”一词的时间,至少不会晚于1893年。这一年,在美国早期史大家赫伯特·奥斯特古德的一篇文章中就出现了“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社会的历史”(the history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ociety)这样的说法。他把“早期现代”用作某种社会特

性的时间限定,已带有明显的历史分期的意味。而且,从其语气来推断,这种提法在当时的美国史学界似乎已是约定俗成的事。^①1908年,《美国历史评论》有一篇书评也采用了“中世纪和早期现代”(the Middle Ages and early modern times)的提法。^②到了1925年,在《美国历史杂志》的前身《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》上,有文章把“中世纪”(the Middle Age)、“早期现代”(early modern)、“现代”(modern)三者并置。可见,此时“早期现代”已明确地成为一个介于“中世纪”和“现代”之间的历史阶段。^③自此而后,“早期现代”作为一个正式的历史分期概念,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美国史家的笔下。比如,美国历史协会1941年的年会有一个主题,就是“早期现代欧洲”。^④1970年,康奈尔大学教授小尤金·赖斯(Eugene F. Rice, Jr.)编写的教科书《早期现代欧洲的奠基(1460-1559)》(*Foundations of Early Modern Europe, 1460-1559*)问世。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,那些在美国大学从事15-18世纪欧洲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,开始赋予自己一个身份标签,即“早期现代研究者”(early modernist)。^⑤而且,“早期现代”还被看成一种富于学术活力的新理念,颇受一些研究者的青睐。一个有趣的例子是,20世纪90年代前期,在美国18世纪研究会的年会上,有一群学者自立门户,声称其研究领域为“早期现代”;他们自承其用意在于打破越来越封闭的历史分期,力图在题材和方法上寻求新的可能性。^⑥

英国史学界自然不甘落后,对“早期现代”的兴趣也趋于增强。1913年,《英国历史评论》刊登一篇札记,其中可见“晚期中世纪和早期现代”(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)这类字眼。^⑦1957年,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第一本英国史家撰写的“早期现代”历史读物,即乔治·克拉克(G. N. Clark)的《早期现代欧洲(约1450-约1720)》(*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about 1450 to about 1720*)。到1970年,“剑桥早期现代历史研究丛书”(Cambridge Studie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)开始出版。这表明,“早期现代”在英国也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历史分期。此后,相关论著不断增加,基思·托马斯(Keith Thomas)、彼得·伯克(Peter Burke)等一批英国史学名家,也不时把“早期现代”一词放在自己文章和著作的标题中。^⑧

在美国和英国以外,“早期现代”的使用情况因国家而有不同。德国(西德)也有一些学者谈到过“早期现代”的概念。1957年,西德哲学家威廉·卡姆拉(Wilhelm Kamlah)讨论“早期现代”(Frühneuzeit),把它界定为一个既不同于中世纪也不同于现代的转型阶段。1990年,德国学者约翰内斯·布克哈特(Johannes Burkhart)沿着同样的思路,进一步把“早期现代”界定为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转型时期。^⑨然则法国、意大利等欧陆国家的史学界,通常不把“早期现代”纳入历史分期之中。对这些国家的史家而言,“中世纪”之后便是“现代”,“现代”之后则有“当代”;而且,“现代”通常指从中世纪结束到法国革命这一时段,大致相当于英语世界的“早期现代”,而“当代”则以法国革命或“二元革命”(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)为起点。例如,布罗代尔的《15至18世纪的物资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一书所涉及的时段,正是英美学界的“早期现代”,但他没有采用这样的提法。^⑩另外,对于君主制稳定且长期延续的国家的历史,欧陆史家有时也采用王朝分期法,甚或以国王在位时期为分期准则。^⑪

“早期现代”理念的出现,反映了历史时间意识的发展和成熟,尤其是体现了对历史运动的连续与变化的“辩证式”理解。美英两国史家在欧洲的“中世纪”和“现代”之间中插入“早期现代”,不仅意在把“文艺复兴”和“宗教改革”从“中世纪”“解救”出来,把它们作为新的历史阶段“开端”的标志,而且更有志于打破传统分期中“中世纪,现代”截然两分的理念,凸显历史的连续性和复杂性,并为长期遭到贬抑的“中世纪”恢复名誉。换言之,在“中世纪”和“现代”之间插入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,表明欧洲并非从“文艺复兴”一步跳进“启蒙”时代,“现代”欧洲乃是始于“晚期中世纪和早期现代”的一系列连续“渐变”的结果,因之“中世纪”并非一无是处的“黑暗”时代,而对“现代”的孕育具有积极的作用。

据美英史家看来,“早期现代”的总体特征在于,它既不同于“中世纪”,也不完全属于“现代”,而是一个过渡和转型的阶段。在这个阶段,欧洲逐渐走出“黑死病时代”之后多种危机的阴影,在经济、政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动;这些包裹在连续性之中的“渐变”不断累积,最终造成了一个“为当今

人们所熟悉的时代”。换言之，“早期现代”作为一个“转型时期”，呈现出朝着某种特定目标持续前行的趋向；虽然中世纪“生活方式的结构”依然存在，而与“现代”的距离也在越来越缩短。在这一既有连续性又有变化的过程中，“旧与新不能截然两分”，而是两者相互渗透，使“早期现代”兼具“中世纪”和“现代”的特征。一言以蔽之，“早期现代”是一个走向“现代”而未进入“现代”的时期。不过，也有学者提出，这样看待“早期现代”的性质，似乎是一种“目的论的眼光”。他们反对用“前现代”或“前工业化”这样的词汇来描述“早期现代”的特征，而强调这个阶段的自主性，称之为一个有着自身特点及“合法性”的时期。^②当具体界定“早期现代”的整体性和融贯性时，不同的史家各有侧重，其说不一。较常见的做法是，把各自所认定的特定时段的主要趋势或过程，装填到“早期现代”的模具之中，用以铸就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。^③

相较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纪年，“早期现代”是一个较具弹性且相对便利的时间框架，因而关于其起讫年代的说法，就不免五花八门，并各有其理据。一般来说，用于欧洲历史的年代断限有1400-1600年、1450-1789年、1450-1800年、1500-1700年、1500-1800年和1600-1815年等多种，而以1500-1800年较为常见。在英国史研究中，“早期现代”则大致相当于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。^④在涉及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时，年代标记更是各各不同。比如，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，欧亚大陆的“早期现代”是一个更长的时段，其起点为1300年左右蒙古帝国的解体，其终结则是1800年前后东西方“大分流”的发端。^⑤

德国学者科泽勒克(Reinhart Koselleck)曾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一个“鞍形期”(德文 Sattelzeit, 英文 saddle-period)的概念,其大意是,德意志历史上曾有过一个转型阶段,许多重要概念的含义在这个时期发生变化,成为今人无需转译即可理解的状态,因而这也是一个走向“现代”的过程,不妨把它想象成一个马鞍形,具体时间则为1770-1830年。^⑥未料“鞍形期”这个说法不胫而走,广受欢迎。一些学者把它拿来使用,并加以重新界定,泛指任意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转折性连接阶段;这一阶段既与前一个时期有

相似性和连续性,又指向并最终连接下一个迥然不同的时期,因而是一个断裂和连续并存的阶段,可根据其主导特征而将它归入此前或此后的时期。^⑦在这种意义上,“早期现代”似乎相当于一个大“鞍形期”,构成“中世纪”和“现代”之间过渡与转折的阶段。当然,在研究“中世纪”的学者那里,“早期现代”与“中世纪”之间的连续性更受关注;对“现代”历史的研究者来说,“早期现代”更多地带有“转型和新起点”的意义。^⑧也就是说,在前一批学者眼里,“早期现代”可以归入“中世纪”;而对后一批学者而言,则须把“早期现代”划到“现代”。

二、“早期现代”的“地方化”和“全球化”

如前文所述,“早期现代”的理念主要源于美国学术界,原本用于描述欧洲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阶段。可是,大力将这个理念引入“非欧洲”历史研究中的学者,却并不是“非欧洲”的学者,而同样是欧美史家,尤其是美国学者。他们长期孜孜不倦地将它推广到欧洲之外的广大地区,把它作为中国、印度、土耳其、俄国、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历史分期的一个术语。

1997年,一批美国学者创办《早期现代历史杂志》(*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*);2010年,该刊成为明尼苏达大学早期现代历史研究中心的所刊。据称,这个刊物的宗旨在于推动“全球早期现代”的研究,尤其鼓励跨国史、比较史和非欧洲历史的探讨。该刊曾开设专栏,从全球视野考察“早期现代性”,意在打破“以欧洲为中心的中世纪/早期现代的分隔”。^⑨另有一些相关的刊物,比如16世纪学会(The Sixteenth Century Society)的会刊《16世纪杂志:早期现代研究杂志》(*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: Th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Studies*),女性研究学者创办的《早期现代妇女跨学科研究杂志》(*Early Modern Women: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*),也经常刊登涉及众多非欧洲地区和国家的论文。最近20余年,在英语国家的史学界,标题中含有“早期现代”一词的地区史、国别史和专题史论著,可谓不胜枚举。设在伦敦和纽约的拉特利奇出版社(Routledge),近年一直在推出“拉特利奇早期现代历史研究丛书”(Routledge Research in Early Modern History),已出各书所涵盖的地域,自然不限于欧洲。

任何一种历史分期,总是有特定的时空条件的限定;一种历史分期适应的地域越广,其学术效用就越大,同时其时间断限也越难以把握。要把“早期现代”的概念用于欧洲以外的广大世界,就不得不面对千差万别的人类经验;而如何从中提取具有较大覆盖面的历史通约性,无疑是一个至难处理而又无从回避的问题。因之无足为怪,早就有学者对“早期现代”理念的合法性和适用性发出疑问,称它在时空两个维度都难以捉摸。他们提出,“早期现代”即便对于欧洲历史也不见得能够成立,遑论把它运用于更为广大的世界;所谓“早期现代世界”更近于无稽之谈,因为这个时期的世界根本无从谈及“现代”,也不存在某种以“早期”形态呈现的“现代性”。总之,“早期现代”的概念实在是“建立在一系列的错误之上”,对于世界历史完全没有适用性。^⑧还有学者谈到,“早期现代”的概念人为地割裂时间和历史,否定“中世纪”遗产的意义,也切断了“中世纪”与“现代”的联系;如果采用“后中世纪”(post-medieval)而不是“早期现代”的说法,反而有助于消解“中世纪/现代”的二元对立。^⑨更有学者调侃道,1400-1800年这个时期与其说是“早期现代”,不如说是“晚期传统时代”(late traditional);而且,“现代”也没有什么优于或凌驾于“传统”之上的地方,反过来,“晚期传统”或许还可以为解决今天的困境提供“意想不到的帮助”。^⑩

从这些质疑的声音中隐约可以听出,“早期现代”在世界历史分期中是否具有合法性和适用性,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看待“现代性”。在英语世界,只要提起“现代”,就会联想到“现代性”,而“早期现代”也就直接关联到“早期现代性”(early modernity)。而且凑巧的是,当“早期现代”之说在美国学术界趋于流行之际,正值带有冷战背景的“现代化”理论形成之时;于是,“早期现代”也就不可避免地同经过“现代化”理论改造的“现代性”粘连在一起。无论是“现代化”,还是“现代性”,首先都是“西方”经验的产物,并且包含“西方”引领或君临世界的旨趣,因之在当前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语境中,只要触及这两个概念,“欧洲(西方)中心论”的幽灵就会自动游荡起来。

美国“现代化”理论的建构者多为当时学界巨擘,诸如爱德华·希尔斯(Edward Shils)、塔尔科特·帕森斯(Talcott Parsons)、加布里埃尔·阿尔蒙德(Gabriel

Almond)、白鲁恂(Lucian Pye)和沃尔特·罗斯托(Walt Whitman Rostow)等,均厥功甚伟。据他们为新兴国家所描画的发展蓝图,未来世界将呈现与当时的苏联迥然不同的景象;由城市化、工业化、世俗化、民主化、昌明的教育、发达的媒体等要素所构成的“现代性”,将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生活于这个世界的人们的感受中。^⑪尽管这种“现代性”最初被作为历史的实际来表述,但它更多地表达了一种对合理社会和美好生活的愿景,被视为理性、进步和发展的归属;而那些与此对立或不合的社会特征,则被视作“前现代”的残余。而且,这种“现代性”往往被看成一个整体,20世纪后期以来欧美学界所津津乐道的“非西方”的“现代”要素,诸如发达的商业,社会救济措施的产生,稳定的大型国家的形成,以及“现代”工业和运输业的兴起,都不能单独作为真正的“现代性”的体现。由此可见,使得“早期现代”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能够成立的“基因”性要素,不仅是从欧美经验提炼出来的“现代性”,而且还有对“现代化”所能带来的全球同质性(convergence,意即“合流”)的信念。在这种“合流”论者看来,所有经历现代化的国家必然告别各自的传统,在社会结构、政治制度、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各个方面,都接近或融入欧美模式,由此形成的的是一个具有同质性的世界。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在1959年曾说:“‘现代’意味着不必追随西方而成为西方。它是在某种意义上摆脱了其地理起源和所在地的西方模式。”^⑫换言之,“现代化”的世界乃是西方模式的“普世化”,而同质性的全球就是一个西方化了的世界。在“现代性”与“现代化”理论结合之后,美国被界定为“现代性”的最新样板,于是“欧洲中心论”也就变成了“欧美(西方)中心论”。引人注目的是,当时美国的学术精英毫不避讳“欧美(西方)中心论”,美国政治学家鲁珀特·埃莫森(Rupert Emerson)的话,便可作为例证:“对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统治精英来说……更须注重按照西方模式来界定的现代化。”^⑬

可是,自冷战后期以来,这种“现代化”理论在世界各地都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批判,它所带有的“中心论”和“优越论”倾向尤其招人厌弃。在欧美学术界,越来越多的学者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,既然对“现代性”的界定主要是基于“西方”的经验,而“早期

现代”的理念又源自欧洲的历史,若把它用于“非西方”世界,就必然会与“欧洲(西方)中心论”迎头相撞,其中所包含的道德和价值意涵难免不断膨胀,以致最终撑破这个概念的合法性外衣。一般来说,“非西方”的学者对“欧洲(西方)中心论”更为敏感,只要正面涉及欧洲或“西方”的历史作用,就总是难以绕过“欧洲(西方)中心论”。例如,有一位拉美学者为摆脱“欧洲中心论”,主张把“现代性”的起点定在1492年,而不是“文艺复兴”或“宗教改革”,因为这个年代所标示的“地理大发现”,凸显了美洲的历史角色。可是,他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,即1492年的重要性以及此后美洲历史中的“现代性”,主要是由欧洲人及其移民后裔所塑造出来的。在这里,“欧洲(西方)中心论”的魅影又悄然飘了回来。^⑧其实,美国学者对原版的“欧洲中心论”也颇为反感。在美国的“大西洋史”框架中,通常以“革命时代”的结束作为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终点;而在有的学者看来,这无异于把欧洲帝国的兴衰作为大西洋史的起讫,显然是强化了“欧洲中心论”的取向。^⑨

可见,如果要在欧洲以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研究中引入“早期现代”的理念,同时又不招致“欧洲(西方)中心论”的嫌疑,就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下功夫。其一,淡化“早期现代”与“现代性”的关联,而仅仅把它当作一个中性的历史时间概念或时间修饰语,如“早期现代资本主义”(early modern capitalism)云云。^⑩在近期欧美的学术出版物中,涉及中国、印度、奥斯曼帝国、日本和(被“发现”以前的)美洲的历史时,所用的“早期现代”一词,有时也带有这种“中性”的意味。其二,有意识地把“早期现代”作为抵制“现代性”宏大叙事的手段,^⑪即不再将“现代性”视作“西方”经验的提炼,以此打破“西方”对它的独占,进而依据具体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特征,重新界定“早期现代”的内涵。^⑫这样就有助于破除“欧洲(西方)中心论”,显示“史学世界主义”(historical cosmopolitanism)^⑬的眼光和胸怀。相对而言,按照后一种路径来处理“早期现代”的学者,不仅人数居多,而且影响也更大。

这些学者所采取的头一种手法,就是把“早期现代”加以“地方化”,以适应广大“非西方”地区和国家历史分期的需要。在欧美关于“现代性”的理论中,

有一脉基于各各不同的社会和人群的经验来界定“现代性”,称“现代性”有不同的形态,且无高下优劣之分,由此提炼出“多元现代性”(multiple modernities)的概念。^⑭从这种观念出发,在16-18世纪的全球,并非只有欧洲产生了“早期现代性”,而且欧洲版的“早期现代性”也并不比其他版本的“早期现代性”更为标准,更为优越。在这些学者看来,“早期现代性”的内涵并非只有以往所认定的一种形态,也不一定形成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这一时期,其内涵也不是只有个人主义、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胜利,以及世界的祛魅。恰恰相反,“早期现代”不同的社会各有其“现代性”,而且它们并非源自欧洲的“现代性”,不是它向世界各地传播的产物,也不是它在传播中发生变异的结果,而是形成于各个社会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之中。^⑮这样一来,“非西方”的“早期现代性”不仅具有独立性,而且在“早期现代世界”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“非西方”的历史自主性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

举例来说,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主办的《代达罗斯》上登过一篇文章,讨论1400-1750年南亚历史的研究。传统观点认为,南亚的现代性是随殖民化才开始出现的,而这位作者指出,应当把长期被夺走的“公认模糊不清的‘早期现代性’”还给16-17世纪的南亚各个社会,因为“历史地看,现代性乃是全球的和同时发生的(conjunctural)现象,而不是像病毒一样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”。^⑯《18世纪研究》2010年春季号也办过一个专栏,其主题是“中国与全球现代性的缔造”,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“把早期现代性中国化”。^⑰毫无疑问,在多样化的“早期现代性”理念的引导下,“非西方”地区和国家的历史获得了新的意义,它们在现代世界形成中的作用也得到了更多的承认。不过,用这种方式处理“早期现代性”,很可能会把它打成一个徒有其名的观念空壳,其作用不过是盛载某种麻痹历史意识的文化虚荣心。

与此同时,另有一些学者尝试对“早期现代”进行“全球化”,也就是从全球史的角度重新定义“早期现代”,进而建构一个“早期现代世界”。其代表人物可以举出两位,一位是美国杜克大学的南亚史学者约翰·理查兹,另一位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已故的世界

史教授杰里·本特利。

理查兹为了把“早期现代”推广到全球,阐述了一套力求自圆其说的思想逻辑。他认为,作为历史分期概念的“早期现代”,并非注定带有欧洲中心论的性质,因为它所标示的不过是人类在自我组织、相互交往以及与自然世界的关系等方面的“急剧而大规模的变化”,这类变化并不仅仅发生在欧洲,同样也可见于欧洲以外的广大世界。具体来说,在1500—1800年,全球出现过6种“大规模的进程”,即“多条全球海上通道的开辟”“真正的世界经济的兴起”“大型而稳定国家的成长”“世界人口的增长”“土地利用的强化”以及“新技术的传播”。在16—18世纪的南亚,这类变化也以特定的面目出现,或者说南亚也处于类似的进程之中。因此,这个时期的南亚乃是“早期现代世界”的一部分,而不能像以往那样,把它称作“莫卧儿时期的印度”“中世纪晚期的印度”或“前殖民地时代晚期的印度”,更不能目为“停滞的印度”。唯其如此,方能更好地把印度融入世界历史。^⑥理查兹这一论说的要旨,在于切断“早期现代”与经典“现代性”的联系,重新界定其内涵和特点,进而使之与欧洲脱钩;由此搭建而成的“早期现代”框架,自然就可以填入任何地区和任何国家的历史经验。

本特利则在汲取和发展理查兹论点的基础上,提出一个微有不同的全球“早期现代”的构想。作为全球史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,本特利自然不难意识到,要把“早期现代”的概念引入全球史,进而构想一个“早期现代世界”,就不得不面对“现代性”和“欧洲(西方)中心论”这两个难题。他就此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。其一,反常道而行之,宣称“早期现代世界”并不是“早期现代欧洲”放大或扩张的结果,相反,只有先把前者描述清楚,才能理解后者,因为“一个更大的早期现代世界的观念,构成一个融贯的早期现代欧洲观念的先决条件”。其二,关注联系和互动,强调“早期现代世界”并不是依据静态的特征来界定的,而是各种“能动的历史过程”在综合作用中逐渐塑造出来的。在1500—1800年间,这些“历史过程”促进和加速了跨文化的互动和交流,而这些互动和交流影响到全球各地人们的“生活和组织其社会的方式”,也即涵盖广泛的人类共同经历。不过,这些

互动过程并未造就一个同质的“早期现代世界”,而是在不同的地方留下了不同的烙印。具体来说,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,有“三大全球性进程”驱动“早期现代世界”的发展,即海上交通路网的形成(使世界各海岸地带得以连通),全球生物物种的交流(对自然环境和人类人口都产生巨大的影响),以及早期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出现(在世界范围内促成了生产、分配、消费和社会组织的新模式)。而且,这三大进程交叉重叠,相互加强,由此引出七个“大规模的发展”,即“人口起伏、大规模移民、对自然环境的强化利用、技术传播、中央化国家政权的巩固、帝国主义扩张和全球文化交流”。这些后果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,它们交织在一起,不仅作用于单个的国家,而且塑造整个世界的面貌,“早期现代世界”由此诞生,并不断发生变化。在这里,本特利并不特别在乎“早期现代性”的含义,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件“混杂的事情”。^⑦

显然,和理查兹一样,本特利刻意在“早期现代”与“现代性”及欧洲之间挖出一条鸿沟,用来隔断“欧洲(西方)中心论”的困扰。而且,他借以界定“早期现代世界”特性的三大历史运动和七种次级趋势,理查兹的文章均已论及。不过,本特利不仅采用了不完全一样的表述方式,而且在方法论和“概念化”方面显得更为周密,尤其是借“跨文化互动与交流”的概念来统驭“早期现代世界”的主要变化。较之片面强调“非西方”在“早期现代”的历史地位,本特利的思路具有更加敏锐的历史想象力。不过,在他所构想的这个“早期现代世界”之中,依然可以嗅到些许的“欧洲(西方)中心论”气息,因为他所提到的那些历史进程和趋势,要么由欧洲所启动,要么为欧洲所主导。

这似乎表明,任何要把“早期现代”加以“地方化”或“全球化”的努力,都注定难以跳出某种“观念迷阵”。一方面,尽管欧洲并非总是世界历史的中心,但它在17—19世纪确实取得了对全球的控制和支配地位,并把自己的印记留在了世界大部分地区;另一方面,“西方”版本的“现代性”无论作为一种历史的提炼,还是作为一种理想的蓝图,都具有某种社会规划和文化定向的功能,因而“现代化”成为许多地区和国家孜孜以求的事业。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

在于揭示和理解过去,而且在于为当前和未来的生活定向,如果因为厌恶“欧洲(西方)中心论”,就彻底否认“现代性”拥有某些基本的共通含义,进而逾越史实和史家伦理的制约而贬抑“西方”,拔高“非西方”的世界历史地位,这样就能更好地理解全球过往的经历吗?就能更好地帮助当今各国人民理解当前的现实、界定未来的目标吗?另外,如果希望借助“早期现代”的“地方化”或“全球化”,以对“非西方”地区和国家进行某种“学术补偿”,或对以往囿于“中心论”的“西方”史学加以“矫枉过正”的改造,难道就能写出一部更加公允的世界史吗?这些问题似乎都值得三思。

三、“早期现代”在国内历史分期中的适用性

身处“非西方”世界的中国史家,对“早期现代”一词并不陌生,但是关于它在中国史学话语中的适用性,他们不是未予特别关注,就是持相当慎重的态度。如果要讨论这个术语能否纳入中国的历史分期体系,还需要首先就一些相关的问题略做梳理。这是因为,同许多来自域外的词汇一样,中文的“早期现代”不仅涉及翻译的分歧,而且牵扯到理论、价值和文化立场等方面的纠葛。

头一件令人头疼的事,便是“early modern”的理解和译法。目前这个术语有多种译法,常见的有“早期现代”、“早期近代”、“近代早期”和“现代早期”等。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翻译其中的“modern”一词。这个问题看似简单,实则至为烦难,长期没有定论,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出现唯一公认的译法。

从“modern”在欧洲产生和流传的历史脉络来看,这个词原本就带有浓厚的历史和价值方面的意涵。在13、14世纪,这个词最先出现于意大利和西班牙,到1600年前后传入欧洲其他语言,逐渐具有“近期的”、“当前的”、“变化了的”、“新异的”、“时髦的”等含义,其意蕴不仅注重当前,而且指向未来。因此,“‘modern’所表达的是人类对变化的认知,尤其标志着一种区分现在与过去的意识”。^④及至16-17世纪,欧洲史家开始采用三段式历史分期,在“古代”和“中间时代”(medium aevum)之后,便是他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,故名之曰“新”(novum)。到了18世纪末,这个“新”的时代就变成了“modern”(拉丁文作

modernus)。^⑤对于“modern”的这些含义,最早接触这个词的日本人无疑是知晓的;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末以汉字新创“现代”一词,用来对译“modern”。20世纪初年,“现代”的译法传入中国,20年代以后渐趋流行。^⑥除“现代”的译法之外,中文里还有“摩登”“近代”“近世”等说法,均与“modern”有联系;其中“摩登”一词系音译,较好地保留了“modern”原初就有的“新潮”“时髦”等意旨。然则以“近代”或“近世”来对应“modern”,能否传递这个词原本含有的指向未来的意蕴,似乎就成了一个问题。诚然,梁启超在提到作为历史分期的“近世”时,称其为“将来史之楔子”,^⑦意在指明“近世”乃是一个连接未来的时代;可是,当后世之人在“近代”后面再添加“现代”和“当代”时,“近世”所含有的一层指向未来的寓意,就不免消散于无形,而变成了一个纯粹指涉过往时代的词。

在现代汉语中,一个外来词有多种译法自是常态,原本不必深究。但问题是,“modern”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词,由它衍生出了一组词,比如“modernity”、“modernization”“post-modern”等;而一组相互关联的词,在译法上最好要有一定的融贯性。如果用“近代”、“近世”来对译“modern”,那么“modernization”自然就成了“近代化”或“近世化”;这样一来,对于目前仍在谋求“modernization”的社会和人群来说,其奋斗的目标岂非是要回到已逝的过去?或许有人会说,“近代化”专指历史中的“modernization”,而当前正在进行中的“modernization”则是“现代化”;可是,对于历史中那些寻求“modernization”(这个词或许当时尚不为人所知)的人们来说,其努力的目标也不是要回到偏于过往的“近代”,而是面向更为美好的未来。至于若把“post-modern”译作“后近代”或“后近世”,其怪异乖违之处就更是一目了然。由此反推,如果把“modern”的译法固定为“现代”,所有这些观念和逻辑上的难题,都会迎刃而解。

在国内学术语言中引入“early modern”还有一个词序方面的问题。这也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节。汉语中常见的“现代早期”,不一定是“early modern”的对译,这一点容后细论;但它作为“early modern”的对译时,就有需要推敲的地方。把“早期”置于“现代”的后面,侧重的似乎是作为时间名词的“早期”,

而不是具有道德和价值意涵的“现代”，因为这里的“现代”已成了修饰语。如前文所述，“early modern”是作为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分期概念而提出的，偏重的是具有定性功能的“现代”，因而只有把“早期”置于前面，作为一个时间定语，才能相对准确地传达出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。也就是说，“early modern”的精确含义是“早期的现代”，而不是“现代的早期”。另外，把“post-modern”译作“后现代”，早已通行于汉语学术界；如果按照用“现代早期”来对译“early modern”的逻辑，“post-modern”就须译成“现代之后”。基于以上种种考虑，“early modern”最为适宜的中文对应词，似是“早期现代”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“早期现代”能不能在中国的历史分期中享有一席之地，直接取决于它是否兼容于当前通行的分期体系。毋庸赘言，国内的历史分期也有自身的演化史。大致在清末民初之际，中国史家开始有意突破单一的朝代分期法，最先引起他们注意的是日本的历史分期模式。梁启超在《中国史叙论》中，参照日本模式，就中国历史分期提出了上世、中世、近世的三分法。^②此后，“古代”以后的时期，逐渐有了“近世”“近代”“现代”等多种说法，并成为中国史学中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，诸如“中国近世史”“中国近代史”“中国现代史”等名目，渐次出现在许多学校的课程表中。^③目前，国内的中国历史分期仍沿用两套体系，一是基于朝代和政权的更替，分成夏商周、春秋战国、秦汉、三国两晋南北朝、隋唐、五代十国、宋元、明清、晚清、民国和新中国等十一个时期；二是借鉴欧洲史学的三分法，划分为古代（远古至1840年）近代（1840—1949）现代（1949—）三个大的阶段。另外还有一种四分法，即古代（远古至1840年）近代（1840—1919）现代（1919—1949）和当代（1949—）。1949年以后，中国的世界历史分期一度接受苏联的模式，也有“古代”“中世纪”“近代”和“现代”四段之分。目前国内的世界历史分期，大多采用“古代”“中古”（中世纪）“近代”“现代”和“当代”的划分；对于“中古”以后的时期，有时也统称“近现代”。

以上各种分期方式，除朝代和政权分期法之外，其母体大抵都是欧洲史学中“古代”“中世纪”和“现代”三分的模式。这些分期方式的长短利弊，自然是

可以商兑的，而“古代”或“中古”以后的分期尤需细加辨析，因为其命名同样牵涉到如何理解“modern”一词的问题。在欧洲史学中，“modern”作为历史分期的概念，最初是相对于“medieval”来界定的。在欧美史家为“中世纪”正名以前，“medieval”通常意味着黑暗、落后、愚昧和迷信，是一个已然终结的“坏”的时代；而“modern”则是一个正在向前伸展的“新”时代，是一个由理性、科学、发展和进步所主导的“好”的时代，是当世史家所认同的“我们自己的时代”。据前文所论，在现代化理论形成以后，“现代”又与“现代性”直接挂钩，带有取代并优于“传统”的含义。在国内通行的历史分期中，“现代”的这些意蕴似乎没有得到完整的保持，因为其中掺入了社会形态理论、文化本位思想等多方面的因素。不过仍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即中国史学中的“近代”和“现代”，虽然所对应的都是“modern”，但一般是“近代”在前，“现代”居后，其位置不能互换。这里似乎暗含一个预设，就是“近代”距今较远，而且已经终结；而“现代”则距今较近，并通过“当代”而继续向前延伸。就此而言，中国史学中的“近代”，与英语世界的“早期现代”似有相近之处。

毋庸讳言，中国的历史分期还受到了日本史学的影响，“近世”之说即是一例。日本史学中的“近世”，本是一个变动的概念，有多种不同的用法。自江户时代以降，“近世”主要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，专指当世或距当世较近的时期。明治以后，这个词产生了“前现代”的意涵，以示与“近代”有所不同，成为一个介于“中世”与“近代”之间的阶段。^④这后一种用法，依稀带有英语世界的“早期现代”的意味。内藤湖南把“近世”的概念用于中国史研究，称唐代为“中世”的结束，而宋代则为“近世”的开端，其标志或核心内涵乃是“贵族政治”衰落，而“君主独裁”兴起。^⑤内藤意在凸显两个时期在性质上的不同，虽未明确赋予“近世”以“现代性”的意涵，但有意无意间仍在比附欧洲现代历史的某种特点，即君主制中央集权国家（绝对主义国家）的兴起。清末民初，经梁启超等人译介，“近世”一词进入汉语，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分期概念。^⑥梁启超还对“近世”做过具体界定，称之为自乾隆末期以迄于当前的时代，其特征是中国进入世界性竞争的潮流，“君主专制政

体”渐为“国民立宪政体”所取代。他还特别强调，“近世”是一个“二千年所未有”的巨变时代，也是“将来史之楔子”（即一个历史新纪元的开端）。而且，“近世”尚处于“萌芽”阶段，“阅时甚短”，不必对它再做划分。^{⑤4}由此看来，梁启超所谓“近世”，在含义上与“modern”完全相同，也是一个区分过去与现在、兼有指向未来之意的标志性词汇。在国内近年的中国史论著中，“近世”一词也颇为常见。其具体用法可分为三种情况：其一，作为一个普通的时间概念，指距今较近的时代；其二，作为历史分期的“近代”的另一种说法；^{⑤5}其三，用以突破作为历史分期的“近代”的局限，涵盖1840年以前而又与其后连通的较长时段。^{⑤6}

当前，在国内史学界的不同研究领域，“早期现代”的运用情况并不一样。世界史学者在必要时便会使用“早期现代”（现代早期、早期近代、近代早期）的提法，而在中国史研究中则只能偶尔见到这类词汇，而且通常出现在回应欧美相关研究的语境中。也有学者专门讨论过中国的“早期近代性”，并援引欧美学界的相关论说作为论据，称现行的历史分期有人为地割裂历史之嫌，如果把“早期近代”之说引入中国史学，就能更好地凸显历史的连续性。^{⑤7}此外，中国史学者有时也会提到“早期近代化”，不过其意思是“早期的近代化”，与“早期现代”并没有什么关系。在更多中国史学者的笔下，“近代早期”通常只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，指中国历史的近代初期或近代前期，而不具有美、英、德史家所赋予的历史分期的意义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，欧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，喜好用“帝制晚期”或“早期现代”来指明清时期的中国；还有人提出，中国早已具备西方意义上的或具有中国特性的“早期现代性”。这也不免给国内通行的历史分期带来冲击和困惑。^{⑤8}在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的场合，有时还会见到一种观念交叉的情形，即把“帝制晚期”和“近代早期”并用，前者仅与中国相关，而后者则专指欧洲。^{⑤9}

无论如何，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，“早期现代”作为一个分期概念和分析范畴，仍有发挥效用的余地，对于英国史、欧洲史和美国史的研究尤其如此。在这些领域，“早期现代”的内涵和性质已有相对公认的界定，而且与研究题材也有较好的匹配度，可以畅

行无碍地作为分期概念来使用。同时，“早期现代”的理念在美英等国的史学中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，中国学者在相关课题上运用这样的概念，似乎比较容易取得沟通和对话的便利。但是，当牵涉到15-18世纪的“非西方”世界时，“早期现代”的用法就难免遇到疑问，甚至会引出学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研究者不妨根据具体地区和国家的主导性历史特征（如王朝起讫、体制兴替、社会变迁、国力盛衰等），以确定有针对性的分期。比如，中国史课题不妨沿袭朝代或政权分期法；日本史研究可以参照国家形态的变动来分期；奥斯曼帝国史可按照其兴衰轨迹来分期；在探究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时，则可把与欧洲人的接触作为一条分界线。在不得已时，也无妨直接采用通用历法时间来做分期；当探讨涉及多国或跨国的课题时，这种办法尤为简便易行。当然，有条件时还可以借鉴霍布斯鲍姆的经验，以经过细致界定的历史运动趋势（如“革命”“资本”“帝国”“极端”等）来划分不同的时代。只不过，这种分期方式需要凭借深刻的历史洞察力，也离不开高超的“概念化”技巧。

然则对于世界史和全球史的编纂来说，具有较大通约性和广泛覆盖面的历史分期，仍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性条件。当前欧美的多种全球史或世界史著述所用历史分期各有不同，但总体上没有完全跳出“古代”“中世纪”“现代”的三分模式。那么，在全球的“古代”（或“中古”）与“现代”之间，是否有必要插入一个中间时段，而且这个中间时段是否可以命名为“早期现代”，依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。如前文所述，美国已有学者极尽所能地建构出几个略有不同的全球“早期现代”，这自然能给中国的世界史编纂带来启发。不过，中国学者若完全照搬，恐有碍于学术创新；而另起炉灶又无补于同既有模式形成有效的对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是否可以做一点尝试性的设想，比如，基于通用历法时间的“世纪”来进行分期，把15-16世纪界定为连接全球“古代”和“现代”的“鞍形期”（相当于“晚期传统社会”），把17-19世纪视作“现代”形成或走进“现代”的时期（相当于“早期现代”），而把进入20世纪以来的阶段看成“我们所生活的时代”（相当于“现代”）。当然，关于这种分期方式的合法性，以及如何建构各个时期的整体性

和融贯性,无疑是一些至为复杂而繁难的问题,需要另做专门的讨论。^⑥

注释:

①施诚:《全球史中的“早期近代”》,《史学理论研究》2009年第4期;另,在几年前的一次研讨会上,向荣教授曾就相关问题做过学术报告。

②于尔根·奥斯特哈默:《世界的演变:19世纪史》第1册,强朝晖、刘凤译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6年,第115-119页。

③William A. Green, "Periodization in European and World History," *Journal of World History*, Vol. 3, No. 1(Spring, 1992), pp.13-53.

④ "Four Hundred and Twentieth Meeting. November 14, 1855. Stated Meeting," *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 and Science*, Vol.3(May, 1852-May, 1855), p.211; "Review of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Firenze by Gino Capponi," *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*, Vol. 121, No.249(October, 1875), p.451; John H. Wigmore, "The Pledge-Idea: A Study in Comparative Legal Ideas. II," *Harvard Law Review*, Vol. 10, No. 7(Feb. 25, 1897), p. 392; Westel Woodbury Willoughby, "The Valu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," *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*, Vol. 15, No. 1(March, 1900), p.88.

⑤James M. Garnett, "Review of An Anglo-Saxon Dictionary by Joseph Bosworth and T. Northcote Toller; 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by James A. H. Murray," *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*, Vol.5, No.3(1884), p.363.

⑥ James M. Garnett, "Early English," *Modern Language Notes*, Vol.5, No.6(June, 1890), p.189.

⑦Thomas Dipiero and Devoney Looser, "JEMCS Forum: What is Early Modern?" *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*, Vol.13, No.2(Spring 2013), pp.69-71.

⑧Ryan Prendergast, "Early Modern: 'By Any Other Name...'" *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*, Vol. 13, No. 4(Fall 2013), p.76.

⑨ Prendergast, "Early Modern: 'By Any Other Name...'" p. 77; Jesús López-Peláez Casellas, "Anthony Sherley's Spanish Writings and the Global Early Modern," *Journal of World History*, Vol.26, No.3(September 2015), pp.552-553.

⑩James Thompson, "Late Early Modern," *The 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*, Vol.13, No.2(Spring 2013), p.72.

⑪Herbert L. Osgood, "The Prussian Archives," *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*, Vol.8, No.3(Sep., 1893), p.496.

⑫Charles H. Haskins, "Review of Bibliographie Général des Cartulaire Français ou relatifs à l'Histoire de France," *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*, Vol.13, No.2(January, 1908), p.322.

⑬John M. Gaus, "Review of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," *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*, Vol. 11, No.4(March, 1925), p.585.

⑭Randolph Starn, "The Early Modern Muddle," *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*, Vol.6, Issue 3(2002), p.297.

⑮Hamish Scott, "Early Modern History: Its Present and Its Past," *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*, Vol. 57, Issue 2(Summer 2022), pp.280-281.

⑯Jean I. Marsden, "Parsing Early Modern," *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*, Vol.13, No.4(Fall 2013), p.70.

⑰"Short Notices," *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*, Vol.28, No.111(July, 1913), p.619.

⑱Starn, "The Early Modern Muddle," pp. 297-298; Phil Withington, *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: The Vernacular Origins of Some Powerful Ideas*, Cambridge, UK: Polity Press, 2010, p.2.

⑲Wolfgang Reinhard, "The Idea of Early Modern History," in Michael Bentley, ed., *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*, 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7, pp.283-285.

⑳布罗代尔:《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,顾良、施康强译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2年。

㉑Reinhard, "The Idea of Early Modern History," pp.288-289.

㉒Euan Cameron, "Medieval and Modern," in C. Scott Dixon and Beat Kümin, eds., *Interpreting Early Modern Europe*, 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2020, p. 18; Reinhard, "The Idea of Early Modern History," p.286; Scott, "Early Modern History: Its Present and Its Past," pp.284-285, 287.

㉓See Jerry H. Bentley, "Early Modern Europe and the Early Modern World," in Charles H. Parker and Jerry H. Bentley, eds., *Between the Middle Ages and Modernity: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*, Lanham, Maryland: Rowan & Littlefield, 2007, pp.15-17; Euan Cameron, "Medieval and Modern," in Dixon and Kümin, eds., *Interpreting Early Modern Europe*, pp.27-38.

㉔Robert Tittler, "Early Modern British History, Here and There, Now and Again," *Albion: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*, Vol.31, No.2(Summer 1999), pp.190-206.

㉕"Editorial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," *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*, Vol.20, Issue 1(2016), p.1.

- ⑳ George S. Williamson, "Retracing the Sattelzeit: Thought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Eras," *Central European History*, Vol.51, No.1(March 2018), p.68.
- ㉑ Gabriel Motzkin, "On the Notion of Historical(Dis) continuity: Reinhart Koselleck's Construction of the Sattelzeit," *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*, Vol.1, No.2(October 2005), pp.145-146.
- ㉒ Cameron, "Medieval and Modern," in Dixon and Kümin, eds., *Interpreting Early Modern Europe*, p.27.
- ㉓ "Editorial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," p.1.
- ㉔ Jack A. Goldstone, "The Problem of the 'Early Modern' World," *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*, Vol.41, No.3(1998), pp.249, 255, 261.
- ㉕ Helen Cooper, "The Origins of the Early Modern," *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*, Vol.13, No.3(Summer 2013), pp.136-137.
- ㉖ Luke Clossley, "Relevance of Things Past: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s of Early Modern Studies," *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*, Vol.50, Issue 1(Spring 2019), pp.142, 146-147.
- ㉗ Nils Gilman, *Mandarins of the Future: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*, Baltimore: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, 2003, p.5.
- ㉘ Quoted in Gilman, *Mandarins of the Future*, p.2, p.6.
- ㉙ David Porter, "Sinicizing Early Modernity: The Imperatives of Historical Cosmopolitanism," *Eighteenth-Century Studies*, Vol.43, No.3(Spring 2010), p.299.
- ㉚ Jerusha Westbury and Anelise Hanson ShROUT, "An Entangled World: Loyalties, Allegiances, and Affiliations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," *Early American Studies*, Vol.11, No.1 (Winter 2013), p.1.
- ㉛ Theodore K. Kabb, "Early Modern Europe from Above and Below," *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*, Vol.45, No.3(September 1973), p.458.
- ㉜ Withington, *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*, p.5.
- ㉝ Sanjay Subrahmanyam, "Connected Histories: Notes toward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," *Modern Asian Studies*, Vol.31, No.3(July 1997), pp.735-762.
- ㉞ Porter, "Sinicizing Early Modernity," p.299.
- ㉟ Shmuel N. Eisenstadt and Wolfgang Schluchter, "Introduction: Paths to Early Modernities: A Comparative View," *Daedalus*, Vol.127, No.3(Summer, 1998), p.5.
- ㊱ Ania Loomba, "Early Modern or Early Colonial?" *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*, Vol.14, No.1(Winter 2014), p.144.
- ㊲ Sanjay Subrahmanyam, "Hearing Voices: Vignettes of Early Modernity in South Asia, 1400-1750," *Daedalus*, Vol.127, No.3 (Summer 1998), pp.99-100.
- ㊳ Porter, "Sinicizing Early Modernity," pp.299-306.
- ㊴ John F. Richards, "Early Modern India and World History," *Journal of World History*, Vol.8, No.2(Fall, 1997), pp.197-209.
- ㊵ Bentley, "Early Modern Europe and the Early Modern World," in Parker and Bentley, eds., *Between the Middle Ages and Modernity*, pp.13, 22-23.
- ㊶ Patricia Seed, "Early Modernity: The History of a Word," *CR: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*, Vol.2, No.1(Spring 2002), pp.1-16, quotation in p.2.
- ㊷ Merry E. Wiesner-Hanks, *What is Early Modern History?* Cambridge, UK: Polity Press, 2021, p.2.
- ㊸ 黄克武:《反思现代: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重构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2021年,第3-12页。
- ㊹ 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》第1册,中华书局1988年重印,《饮冰室文集》之六,《中国史叙论》,第12页。
- ㊺ 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》第1册,《饮冰室文集》之六,《中国史叙论》,第11页。
- ㊻ 黄克武:《反思现代》,第10页。
- ㊼ 喻乐:《日本史学中“近世”概念的流变》,《史学理论研究》2020年第1期。
- ㊽ 参见李华瑞:《“唐宋变革”论的由来与发展(上)》,《河北学刊》2010年第4期。
- ㊾ 朱文哲:《清末民初共时意识下的“近世”书写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》2021年第5期。
- ㊿ 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》第1册,《饮冰室文集》之六,《中国史叙论》,第12页。
- ① 陈向阳:《近世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再讨论》,《安徽史学》2003年第2期。
- ② 朱英:《近世中国商人发展历程的新探索——评唐力行著〈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〉》,《历史研究》1994年第6期。
- ③ 李天纲:《关于中国的“早期近代性”》,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》2002年第2期。
- ④ 冯乃希:《近世、帝制晚期,抑或早期现代——中外明清文史研究中的学科与问题》,《开放时代》2022年第1期。
- ⑤ 李娜:《“王朝权力的结构与遗产——帝制晚期的中国与近代早期的欧洲之比较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》,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2010年第9期。
- ⑥ 感兴趣的读者或可参阅李剑鸣:《现代世界历史叙事的时间框架》,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》2024年第2期。